

## 近代中法關係史研究集錦—— 評介陳著《近代中法關係史論》

簡晏\*

書名：近代中法關係史論  
作者：陳三井  
出版地：臺北  
出版者：三民書局  
出版時間：1994年1月初版  
頁數：306頁

### 一、引言

中外關係史研究與其他歷史研究不同之處，在於它的國際性質。近代中外關係的主軸從十九世紀開始，中國朝貢體系的世界與新興列強帝國主義擴張政策的外交，乃係兩種秩序的會合。朝貢制度以中國之天朝為中心，各方貢使來華朝覲，禮尚厚往薄來，維持著政治、經濟與文化的穩定交流。西方的國際關係於一六四八年簽訂西發利亞條約(Treaties of Westphalia)之後，確立歐陸列國制度之國際法(Modern State System of Europe)，此法使各國在主權平等與政治獨立的基礎上，藉由談判交涉和締盟結約的方式來調整國內外的關係與執行既定的政策。中國舊皇朝尚未及認清國際社會的運作規則，政權即由共和政體接替。廿世紀的中國，

\* 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民國新締，在運輸與通訊科技革新的推波助瀾下，積極參與國際政治，進入了世界體系。近代中外關係的發展與中國的現代化息息相關。準此，中外關係演變隨世局推進，兩次世界大戰，強權之間彼此有所消長，整個國際社會關係邁向多元發展。中國對外的關係經由大使、公使、領事、代辦等不同層級的運作，推廣政治、經濟貿易合作與文化的多重交流。由是，近代中外關係史的研究便成爲一個重要且必須持續觀察的重要課題。

中法早期並無正式外交接觸，往來多爲零星之商旅。近代中法關係在明清之際，傳教士來華多以科學技術與朝廷建立關係。清康熙八年（1688），法王路易十四派遣耶穌會五位學有專精的科學家來華，主要是文化學術上的交流。鴉片戰爭之後，中法關係在本質上有了很大的變化。法國殖民擴張的政策，因教案、商務衝突不斷，一再與中國兵戎相見，並參與列強瓜分中國，攫奪在華利益。民國建立後，中國積極爭取獨立平等，中法關係乃逐步趨於正途，往來商貿、文化學術也較密切頻繁。

而近代中法關係史的研究，早期僅散見於外交史的通論性著作中，並無深入探討就其中之關係與涉及的問題。究其因乃中法雙方的外交檔案資料皆未整理公開，致使研究無著；再者，如若研究人員的語文能力不足，則研究倍感困難。研究中法關係史至少必須兼通中、法、英三種語文，有意願投入研究的人士，相對而言，顯得稀少。

《近代中法關係史論》一書作者陳三井係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史地系畢業，法國巴黎大學文學博士。曾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員、副研究員、研究員。著有：《近代外交史論集》、《近代中法關係史論》、《現代法國問題論集》、《國民革命與台灣》、《中國國民黨與台灣》、《勤工儉學運動》、《華工與歐戰》、《勤工儉學的發展》、《台灣近代史事與人物》、《鄭成功全傳》（合著）、《人類的歷史》（合著）等書。《近代中法關係史論》是作者將他所研究，有關於近代中法關係史的論文集書，書中每篇論文都已在各學術期刊論文集裏刊載過，如：《思與言》、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近史所集刊》、《第二屆中外關係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等，將之集結成書，方便後學研讀近代中法關係史。此書之付梓，依作者在自序中所言，乃為其恩師郭廷以先生九十冥誕之獻禮，以表孺慕之情，永誌師恩。實則此書不僅在緬懷恩師，更是啟發引領吾輩後學之力作，開拓中法關係史研究的面相，使中法關係史得於史學之林居一席之地。

## 二、本書五大主題

### (一) 法國殖民遠東與對華政策

〈安鄴與中國〉、〈十九世紀法國的殖民主張〉、〈茹費里的殖民思想及其對華政策，1881-1885〉此三篇論文在論述法國人殖民思想之根源、特徵及其對華政策。

第一篇〈安鄴與中國〉，此篇介紹一位靈魂人物：法國海軍軍官安鄴(Marie Joseph François Garnier, 1835-1873)。一八六四年安鄴用 Francis Garnier 之筆名發表《一八六四年的法屬交趾支那》(*La Cochinchine Française, en 1864*)<sup>1</sup>一書，提出探航中南半島內部以開闢中國西南商道的構想，在海軍中引起極大的迴響。一八六六年組成探航團，前後歷時兩載，共航行九千九百六十公里。此行之收穫：一為證明湄公河之不適航行，二是證實了紅江為華越交通之要道。<sup>2</sup>一八七二年二月，安鄴在《地理學會會刊》(*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 Géographie*)發表專文指出：由海路與中國南部各省通商的最短捷而輕便的路線，應係紅江(Fleuve Rouge)，而非長而險阻多又耗銀財的長江。

一八七三年法國軍火商人堵布益(Jean Dupuis, 1829-1912)在滇越從事非法販鹽，遭越南朝廷驅逐，遂引發北圻問題。<sup>3</sup>法國交趾支那總督海軍上將杜丕(Amiral

<sup>1</sup> 本書頁 5【*La Cochinchine Française, 1864*】乃為誤編。

<sup>2</sup> 本書頁 7 註 5 原載為「邵循正，《中法越南關係始末》，頁 26。」作者徵引此書的版本可能為大陸清華大學研究院學業論文叢刊，筆者所持為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在頁 35。湄公河就是瀾滄江，但邵循正皆寫為瀾滄江，陳三井多寫為湄公河。持平而言，同一條江河，在中國領土部分稱瀾滄江，在越南領土部分稱湄公河。論中法關係史而言，邵循正所寫為確，然就法文原文資料，卻稱為湄公河(Mékong)。

<sup>3</sup> 邵循正，《中法越南關係始末》，頁 41。侵犯越南主權，違背《壬戌條約》。

Dupré)覬覦北圻已久，函告海軍部將以武力佔領該地，並訓令安鄴以驅逐堵布益為藉口，派兵入侵北圻。在河內與中國黑旗軍交鋒，結果法軍大敗，安鄴及其部將皆陣亡。此役延緩了中法正面衝突與越南成為法國殖民地達十年之久。

安鄴在其著書《從巴黎到西藏》(*De Paris au Tibet*)中論及中國：「一味追求船堅砲利，期得以夷制夷，無非是另一次戰鬥的準備，目的在避免改變，統治者甚至不惜一切代價求之。」此一見解確有其精闢獨到之處。總上以觀，安鄴志在為法國建立一個東方帝國，政治虛榮心大於經濟利益的目的。然而當時法國在普法戰爭初敗，國力未逮，巴黎當局並未支持安鄴的遠征冒險。

第二篇〈十九世紀法國的殖民主張〉，自一八七八年柏林會議之後，<sup>4</sup>新帝國主義(New Imperialism)的向外擴張野心正熾，海外殖民地的奪取成為歐洲政治風向的主流與外交的重心，法國亦不例外。但在歐洲政治與國內的「壓力團體」或利益團體的影響之下，法國的殖民主張卻轉趨保守，因為大部分的法國人並不真正希望對外殖民擴張。歸結有三個理由：一、殖民遠征將轉移法國欲復仇之目標（德國），而該一目標一直是法國十年生聚教訓、臥薪嚐膽，所不敢須臾或忘者；二、在一般法國人的心目中，對於第二帝國時代的若干次遠征冒險，特別是拿破崙三世(Napoléon III, 1808-1873)之遠征墨西哥，<sup>5</sup>不但記憶猶新，且餘悸猶存；三、最後也是最具決定性的因素，實乃殖民遠征勢將引發國際爭端，以當時法國的處境，這是她所不能不戒慎恐懼，引以為戒者。

然而如第一篇所提之人物安鄴，法國殖民的鼓吹者與護衛者，還有：地理學會(Société de Géographie)秘書長莫諾瓦(Charles Maunoir, 1830-1901)，瓦倫西亞(Valenciennes)地理學會秘書長丕賓(Bebin)。經濟學者列勒華·伯利俄(Paul Leroy-Beaulieu)所著《論現代民族的殖民》(*De La Colonisation chez les Peuples*

<sup>4</sup> Congress of Berlin, 1877-1878 俄土戰爭之後，由俾斯麥召集各國在柏林會議，目的主要在修改聖斯特凡諾條約(Treaty of San Stefano)。

<sup>5</sup> 一八六一年墨西哥共和國止付歐洲各國外債，法國、英國與西班牙三國軍隊登陸墨西哥欲行干預，因法國野心扶植墨西哥帝國，英西二國退出。一八六七年拿破崙三世因以三萬法軍支持在墨西哥不受欢迎的哈布斯堡王室所費甚多，且遇美國壓力而捨棄墨西哥帝國，皇帝麥西米連於一八六七年六月為墨西哥人俘獲而槍殺。

*Modernes*)，學院派學者夏爾姆(Gabriel Charmes)所著《對外政策與殖民政策》(*Politique Extérieure et Coloniale*)，迪戎大學(Université de Dijon)<sup>6</sup>教授葛發雷(Paul Gaffarel Paul Gaffarel)所著《法蘭西的殖民地》(*Les Colonies Françaises*)，天主教傳教士拉布瓦頌(l'Abbé Raboisson)神父所著《關於法國殖民地與殖民地的比較研究》(*Études sur les Colonies et la Colonisation au Regard de la France*)。法國第三共和初期，鼓吹對外殖民的刊物有：《論辯日報》(*Le Journal des Débats*)、《法國經濟學人》(*L'Économiste Français*, 1873 年創刊)、《地理評論》(*La Revue Géographique*, 1877 年創刊)、《雙世界雜誌》(*La Revue des Deux Mondes*)等，他們所宣揚的是一種聲望政策(*politique de prestige*)，為法國的未來籌劃，希望法國成為世界第一等強國。惟迫於現實，遭遇國會的杯葛與輿論的質疑，終未能真正付諸實際行動。

第三篇〈茹費里的殖民思想及其對華政策，1881-1885〉，茹費里(Jules Ferry, 1832-1893)出生法國東部的臥茲(Vosges)省聖帝葉(Saint-Dié)市，家道小康，一八四八年二月在史特拉斯堡(Strasburg)完成中學學業。於巴黎大學法學院修業時即涉入政治，一八七九年二月擔任公共教育部長(Ministre de l'Instruction publique)，一八八〇年九月首次受命組閣。茹費里在一八八一年突尼斯之役前，與海外事務未有任何接觸，成為內閣總理之後才逐步醞釀了他的殖民思想。無可否認者，是乃先有了一層虛榮心的動機，茹費里認為法國要維持大國的地位，應該把她的語言、風俗、國旗、武器、天才，帶到世界各地。但以當時之情勢，茹費里內閣對外殖民擴張的主要外交顧慮是：海外擴張勢將遭英國之強力競爭，大陸政策亦勢必與德國發生衝突。可說在海外殖民一節雖可獲德國之支持，卻遭英國極大的阻撓。<sup>7</sup>然帝國主義的野心是得寸進尺，永無止境的，或認為對北圻的佔領、安南的鯨吞，誠乃繼續征服中國西南的起點。此說遭茹費里在一八八三年十月十一日議會演說

<sup>6</sup> 本書頁 32，【迪松大學(Université de Dizon)】係為誤編。

<sup>7</sup> 對北圻「戰而不宣」時，英國首先宣布中立，無異宣示中法處於戰爭狀態中。決定對台灣實行米的封鎖時，英國立即抗議。本書頁 51。

中否認。<sup>8</sup>作者對茹費里的答辯，咸以此乃軍事之秘密行動，基於外交政策的考慮，政府官員在議會的答辯並不能代表實際的決策與行動，當有所隱瞞，難以完全採信。<sup>9</sup>

## （二）法國與中國革命

〈法文資料中所見的孫中山先生〉、〈法國與辛亥革命〉二篇探討法國在辛亥革命歷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包括與孫中山的關係。

第一篇〈法文資料中所見的孫中山先生〉，作者列舉法國人對孫中山的推崇：漢學家高第(Henri Cordier, 1849-1925)、里昂中法大學校長杜巴別(Georges Dubarbier, 1888-1972)、巴黎大學教授謝諾(Jean Chesneaux, 1922-2007)等，對於孫中山領導革命的貢獻和人格的偉大，乃至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是一致的肯定。雖言法國人推崇孫中山，但實際上法國人對孫中山的革命活動是：同情有之而終至食言；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廿一日孫中山在巴黎的外交亦且無功，法國政府拒絕貸款。「法文方面有關中山先生的研究資料甚鮮，惟檔案方面可供開採發掘者則相對豐富。」這是作者的結語。

第二篇〈法國與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爆發之際，法國適逢摩洛哥事件(Coup de force d'Agadir)與德國齟齬，無暇東顧，故始終主張列強應持中立立場，以不干預為要。此種態度自有其用意：在東方可以保護其越南殖民地的利益，在西方則可全力抵抗德國。再者，因巴黎與北京遠隔，外交問題之處理，駐中國使領事館有較大的權限：漢口領事羅氏(Ulysse-Raphaël Réau)力主不干涉中國革命，上海總領事拉巴蒂(Dejean de la Bâtie)反對上海中立化，北京公使馬士理(Jacquin de Margerie)則討好袁世凱。

<sup>8</sup> 茹費里說：「沒有人想征服這個龐大的帝國。」本書頁 55。一八八三年二月茹費里二度出任閣揆，第三共和海外殖民政策政正興。A. Bonifacio et P. Maréchal, *Histoire*, Hachette, Paris, 1961. p173, p177.

<sup>9</sup> 本書頁 55。

### （三）中國與歐戰

〈中國派兵參加歐戰之交涉〉、〈歐戰期間之華工〉、〈基督教青年會與歐戰華工〉、〈陸徵祥與巴黎和會〉等，以上四篇在闡明中國一度有意派兵參加歐戰，其後改遣華工「以工代兵」參戰的經過、貢獻以及戰後在巴黎和會所受之不平等待遇。

第一篇〈中國派兵參加歐戰之交涉〉，中國為對抗日本於山東權益之攫掠，乃有藉機參戰以抵制日本侵略之決心。中國參加歐戰，外有日本外交之杯葛與武力之威嚇，內有黎元洪、馮國璋及在野士紳之反對。民國六年（西元一九一七年）三月十四日因法國郵船亞多士(Athos)號沉沒事件，<sup>10</sup>北京政府正式宣布對德斷交，並於八月十四日對德宣戰。之後廣州軍政府亦宣布對德國、奧地利開戰，以示南北對外立場一致。中國派兵參加歐戰之交涉，宣示意義多於實質成效，政治利益多過軍事行動，未來前景遠多於當前關係。

第二篇〈歐戰期間之華工〉，歐戰期間，協約國法、英、俄因國內壯丁多赴前線參戰，工廠缺工，農務廢弛，於是先後到中國招募華工。我國二十餘萬名工人在合同保障與政府監督下遠赴歐洲，參與軍火製造、支援後勤運輸、伐木採礦等工作，對盟國人力資源之補充，乃至歐戰之獲得勝利，有不可磨滅的貢獻。

第三篇〈基督教青年會與歐戰華工〉，歐戰期間，中國實際派遣了約十七萬五千名工人到歐洲戰地工作，華工遂亦成為青年會的工作對象。主要的課題有：道德的輔助、知識的增進、體能的鍛鍊、情感的聯絡與其他生活上的服務，如寫信、鼓舞士氣與死難者的安葬等。

第四篇〈陸徵祥與巴黎和會〉，陸徵祥生於一八七一年，一八九二年北京同文館法文科卒業。隨即開始外交生涯，先赴俄京聖彼得堡，長達十四年，一九〇六年再抵海牙出使駐荷蘭第一任全權公使，一九一一年改任駐俄公使，一九一八年

<sup>10</sup> 該船自上海出航，載有華工九百人，於地中海附近遭德國潛艇擊沉，遇難者高達五四三人。一九一七年一月卅一日，德國實行無限制潛艇政策(Unrestricted submarine warfare)。

巴黎和會以中國外交總長身分兼首席代表，率中國代表團出席大會，<sup>11</sup>因山東問題力爭無效，遂拒在凡爾賽對德合約簽字。和會結束後返國，九月辭卸外長職務，暫且退隱。一九二二年偕夫人培德女士赴瑞士養疴，北京政府發表其為駐瑞士公使，一九二六年夫人謝世，入比利時本篤會修道院修道，一九四九年辭世。

陸氏出任巴黎和會首席代表，作者認係是北京政府之失著，究其因：一、陸氏受傳統歐語訓練，和會雖在巴黎舉行，強勢語言為英語，新興強國美國政治領袖與之素無淵源，重要問題均推顧維鈞以英語答辯。二、陸氏與日本曾有廿一條交涉之恐懼經驗，對日本之強悍處處退讓。三、陸氏健康不佳，身體羸弱，無力應付久長且任務艱鉅之和會任務，遇事不能明斷，影響中國在和會積極部署的努力。

#### （四）中法文化、外交關係

〈華法教育會的成立及其活動〉、〈法國前總理班樂衛訪華之行的意義〉、〈抗戰初期中法交涉初探〉、〈中法斷交前的一段外交秘辛—法國專使團的艱困訪華行〉四篇剖析從民初到一九六四年中法斷交時，雙方的文化交流活動與外交起伏的關係。

第一篇〈華法教育會的成立及其活動〉，華法教育會(Société Franco-Chinoise d'Éducation)是中法學者文化教育學術團體，做為旅法華人文化教育事業以至實業的總機構。一九一六年六月廿二日在巴黎成立，由蔡元培、李石曾、及法國學者歐樂(Aulard)、國民議會議員穆岱(Marius Moutet, 1876-1968)等人所創建。之後在北京、上海、廣東等地設立分會。首任會長歐樂和蔡元培，副會長李石曾和穆岱。宗旨是：「發展中法兩國之交通，尤重以法國科學與精神之教育，圖中國道德、智識、經濟之發展。」其主要工作是發展中法友誼關係，編輯翻譯刊印中法文書報，<sup>12</sup>聯絡中法學者和學術團體，鼓勵中國學生到法國留學，並推介法國人遊學中國，

<sup>11</sup> 全權專使四人：顧維鈞、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祖。

<sup>12</sup> 主要為《旅歐雜誌》與《華工雜誌》。

辦理華工教育，在法國設立華文學校和講習所。經費主要來源係會員繳納之會費、公款補助、<sup>13</sup>公益捐助與產業孳息。設評議會和幹事會。幹事會設會長、副會長、書記、副書記、會計各二人，均由中法雙方各派一人。每年召開一次會員大會(在法會員參加)。一九二一年該會因財政虧空，遂宣布與中國留法學生脫離經濟關係，致使會方與留學生矛盾激化。且會內派系林立，管理不善，人謀不臧，賬目混亂(發生侵吞公款等事項)，風潮愈演愈烈，導致學生事務主任劉厚被毆事件發生，勤工儉學諸生包圍駐法使館事件，終至宣告解散。

華法教育會設立的動機無可厚非，探究運動失敗之因應係：但憑天真空想缺乏縝密周嚴的計畫，組織不健全。反對偶像崇拜，崇尚自由，標榜互助精神，無政府主義色彩濃厚。急功近利，西化之念過切，以至浮濫，遇事退縮，終無所成。

第二篇〈法國前總理班樂衛訪華之行的意義〉，中華民國建立迄民國八年，中法的文化學術交流幾可稱之為一不平衡的單行道，我國學生大批赴法，摩肩接踵而去，法國卻甚少教育學術界人士東來。一九二〇年五月十九日法國前內閣總理、巴黎大學教授暨中國學院院長班樂衛(Paul Painlevé, 1863-1933)率訪問團一行五人自法國勒哈佛港(Le Harve)出發來華訪問，<sup>14</sup>北京大學首開先例，八月卅一日頒授樂衛名譽博士學位。除北京外，訪問團足跡遍及天津與上海等地，並與中國政界、議會、文化學術界、實業界作廣泛的接觸，亦引起報章雜誌較多的注意和報導，在中法文化交流史上意義重大。具體成果有：一、里昂中法大學的籌設得以繼續，並如期開學。二、促成法國庚子賠款的提早退還。三、巴黎中國高等研究學院(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de Paris)由班樂衛主持，因獲得中國政府的支持得更形發展，成為中國與歐西文化溝通的橋樑。<sup>15</sup>四、法方提議重印《四庫全書》，共二十五萬卷，做為法國漢學研究中國文明的重要資料與教材。

<sup>13</sup> 法國政府補助華工教育每年一萬法郎。

<sup>14</sup> 其他四位成員為：法國科學院(l'Académie des Sciences)院士、巴黎高等師院(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de Paris)院長波萊爾(Émile Borel, 1871-1956)，巴黎大學法學院政治教授馬丁(Germain Martin, 1872-1948)，鐵路及礦務總工程師那達爾(Joseph Nadal, 1864-?)，文學作家勃恩那( Abel Bonnard, 1883-1968)。

<sup>15</sup> 今譯為漢學研究所，隸屬法蘭西學院(Collège de France)。

第三篇〈抗戰初期中法交涉初探〉，抗戰初起，法國對華外交政策採取「順應時勢，見風轉舵」(policy of temporizing)，以九國公約與英美對華態度為立場，與英美採取平行行動。爾後，法國為維護越南主權，對日本一再讓步，關閉滇越公路，復允日軍假道越南攻滇，對我國造成極不利之形勢。抗戰初期中法交涉主要事項為：假道越南運輸、中法軍事合作與對汪偽政權的態度。一言以蔽之：中國有求於法國者眾，法國有求於中國者鮮。主動交涉中國表現較為積極，惟法國在歐洲處境艱難，無暇東顧，故中法交涉並未獲得理想成果。

第四篇〈中法斷交前的一段外交秘辛—法國專使團的艱困訪華行〉，一九六四年元月法國在與中共建交前，戴高樂曾派遣其私人代表貝志高將軍(Général Zinovi Pechkoff)<sup>16</sup>與紀業馬(Jacques Guillermaz)<sup>17</sup>教授攜其親筆函來華。專使團之任務，在向中華民國政府轉達法國政府之決定與其在中國事務上將採取「兩個中國」之立場，而不主動與我國斷絕外交關係。此前，一九六三年九月戴高樂曾派遣佛爾(Edgar Faure, 1908-1988)訪問中國大陸，在訓令中可以看出戴高樂的現實主義政策，一開始並非主張「兩個中國」，而是標準的「一中一臺」，承認中國大陸是法律的實體，而臺灣只被視為一政治實體，仍然可以透過代辦(Chargé d'affaires)的方式，維持雙方外交關係。故貝志高專使的臺北之行，並無任何談判之授權。

### (五) 附錄

〈中法戰爭的法方檔案與法文著作〉、〈中法關係研究之回顧〉針對中法雙方檔案資料略加介紹，並對歷來中法關係史的研究成果做一全盤的回顧與檢討。

〈中法戰爭的法方檔案與法文著作〉，中法戰爭起於越南宗主權的爭執，但後來雙方衝突擴大，閩海成了主要戰場，臺灣更成為直接遭受攻擊的目標。其歷史意義在：孫中山決覆清廷，創建民國；清廷朝野注意海防，一場臺灣的保衛戰，

<sup>16</sup> 貝志高(Zinovi Pechkoff, 1884-1966)俄裔法國陸軍准將(Général de brigade)。

<sup>17</sup> 紀業馬(Jacques Guillermaz, 1911-1988)法國中國近現代研究中心(Centre d'études sur la Chin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學者。

法方「據地爲質」的政策，台灣一躍而爲「中國存亡有關」之重要樞紐。

〈中法關係研究之回顧〉，作者認爲成果不豐碩的原因：一是中法雙方的外交檔案，尙未解禁公布或出版。二爲語文的限制(已如前述)。值得注意的是在專書部份中提及雷努凡(Pierre Renouvin)所著《遠東問題：1840-1940》(*La Question d'Extrême-Orient, 1840-1940*)，嘗試對「深遠力量」(*forces profondes*)<sup>18</sup>的分析：一是亞洲眾多的人口，二是歐洲人想獲取此一廣大市場的意願。此書觀點雖不能概括各國向外擴張殖民的複雜動機，然以經濟、心理層面的分析，在史學著作上或有其獨到之處。另一著作在探討「雙重忠誠」(*dual royalities*)的問題：Steven A. Leibo所撰《*Transferring Technology to China: Prosper Giquel and the Self-strengthening Movement*》(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5)。探討法國海軍派日意格(Prosper Marie Giquel, 1838-1886)到中國創設福州船廠，日意格在法國的技術轉移和中國自強運動的成敗中，成功的調和了「雙重忠誠」。

### 三、本書之學術價值

作者早從一九六〇年代開始便開始深耕外交史的領域，尤其在中法關係史方面，除中法雙邊基本史料與論著之外，並參照其他國家史料論著，涉及層面深廣，論著豐碩，史識見解鞭辟入裏，文風雄健，成就優異。除作者的聰敏努力用功之外，亦顯示在自由開放的社會，個人的才華得以施展，歷史文化的工作也能夠向下扎根與向上提升，深度的延伸與廣度的拓寬都趨向最大的可能，而得多元和諧並存。在學術上有此錦繡燦爛，在社會上當是有繁榮經濟的支撐。甚者，作者之學術成就，深爲吾輩後學所景仰，亦盼得藉由行文立論給予讀者樹一典範的學習目標，人文精神更優於其學術之價值，此歷史深意誠不可忽視、不容動搖。

〈安鄴與中國〉一文中提到「榮譽勳位軍官」(*Officier de la Légion d'honneur*)給讀者一個法國官僚制度的訊息，藉此可以探究比較中法官僚制度的異同。全權

<sup>18</sup> 社會史觀點，注重「社會力量」(*social forces*)，義大利歷猶太裔史學家莫米葛里安諾(Arnaldo Momigliano, 1908-1987)提出的史學理論。

處理(Carte Blanche)，政治外交辭令的確切翻譯，可見作者之專業。又作者畢業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史地系，首篇論文安排地理的探勘成就及影響，著實不凡。

〈十九世紀法國的殖民主張〉，研究這個主題的學者甚夥，作者除一己之見解外，並介紹中(張蔭麟)、英(John Stuart Mill)、美(Lloyd Eastman)、法(Jean Ganiage)、日(坂野正高)多國學者的論著意見，是外交史學術論文多重鏡返(Multiple reflections)史學方法的精心之作。

〈茹費里的殖民思想及其對華政策，1881-1885〉，本篇由「環境是否對歷史人物構成影響？其影響程度又如何？」的歷史問題(histoire-problème)切入研究歷史，對法國第三共和政體作一側面的剖析。普法戰爭失敗後國內紛亂，鄰旁有強敵德國與英國，故遇事觀望。一八八〇年經十年休養生息之後，法國政策丕變，茹費里遂有「近代法國殖民擴張使徒之稱」。歷史視角在時代的大架構下，將法國的對華政策解析得甚為透澈。

〈法國與辛亥革命〉點出西方列強對待革命政府不予法律之承認(De Jure Recognition)，對南京臨時政府有事實上之承認(De Facto Recognition)，弱國外交之艱難一語中的。同時也透露一個訊息：中國必須學習進入新世界體系，認識成爲世界之一員所需具有的法則規章，讓世界各國的文化進入與中國融匯成爲新中國的文化，以促成中國現代化。「法律之承認」、「事實上之承認」都是國際社會規則術語，認識它們，才能在新時代、新世界有發揮的空間。

〈中國派兵參加歐戰之交涉〉屬一翻案文章，由檔案史料所紀錄的交涉過程看出：無論段祺瑞也好，不管徐樹錚、靳雲鵬也罷，都一本正經的認真討論，鄭重其事的交涉過，確實想真正派軍參戰，以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所憾者，由於段祺瑞爭取美國財政支援不成，最後轉而接受日本的西原借款，改變以後中國的外交態勢，加強日本對中國的控制與操縱，影響深遠！

〈法國前總理班樂衛訪華之行的意義〉，受第一次大戰的刺激，西方國家開始反思人類文明，將眼光再次轉向中國所代表的東方文明。一九一九年北洋政府交通總長葉恭綽赴歐考察期間，向法方建議在巴黎推廣中國文化，得到前總理，法

蘭西學院院士班樂衛的熱烈支持。一九二〇年三月巴黎中國高等研究學院正式成立，班樂衛即來華訪問，與北洋政府合作。當西方遇見東方，不一定是衝突、戰爭，也可以和諧、合作，衝破高山大洋的阻隔或意識型態的偏執，追尋文化的“另一半”。班樂衛訪華之行透露的訊息與顯現的意義重大，東西文化交流的作用得絲縷不絕，此行肇基之功厥偉。

北京大學授予班樂衛榮譽博士學位，在我國教育史上也有重大的意義。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指出：大學之宗旨，凡治哲學、文學及應用科學者，都要從純粹科學入手。治純粹科學者，都要從數學入手。班樂衛為數學大師，可以代表此義。北京大學既設在中國，於世界學者共通研究之對象外，對於中國特有之對象，尤負特別責任。班樂衛先生最提倡中國學問的研究，又可以代表此義。<sup>19</sup>北京大學授與班樂衛榮譽博士學位，不但是北京大學重要的紀念，實可為我國教育界之大事記。

班樂衛受葉恭綽之邀率員來訪，除交換文化教育計畫外，並考察中國鐵路的營運情形。此訪問團的訪華之旅，在政治與經濟上亦增添了外交上的意義。

#### 四、關於書中的幾個問題

〈安鄴與中國〉重點在新帝國主義強勢的國力與先進的科技對相對落後地區的偵查工作，地理的探勘是主要項目，西方國家展開航海時代以後，對中國不同的地區做過詳盡的調查，以便取得資源。安鄴的冒險歷程在歐洲得到相當高的評價與榮譽，學者可以依安鄴的著書，探究法國對中國的意圖。小瑕疵是編排的誤編，官銜不清，如 *Amiral* 是海軍上將，並非總督之意。

〈法國與辛亥革命〉漢口領事羅氏(*Ulysse-Raphaël Réau*)，作者引用法國外交部新編檔案：*Annuaire Diplomatique et Consulaire*, 1911, 27/238, *Rapport de Réau à Picot du 30 sep.* 在〈中法戰爭的法方檔案與法文著作〉、〈中法關係研究之回顧〉兩篇文章中，並無法國外交部新編檔案《*Annuaire Diplomatique et Consulaire*,

<sup>19</sup> 本書頁 236。

1911》該資料的介紹。筆者雖然無法查閱相同的檔案，但是其他的法國外交人員可以經網路搜尋得到印證，唯獨漢口領事羅氏的中法文姓名都有超出常理的書寫方式，有待查明。

〈歐戰期間之華工〉我國廿萬華工於合同保障與政府監督之下遠赴歐洲，〈基督教青年會與歐戰華工〉中國曾派遣約十七萬五千名華工到歐洲戰地工作。同在歐戰期間，華工到歐洲的人數統計明顯差異，有待查明。

〈華法教育會的成立及其活動〉是一個廣泛被探討的主題，關於勤工儉學運動，中國當代許多重要人物，如：周恩來、鄧小平、陳毅、楊尚昆、張崧年、王若飛、聶榮臻、劉伯堅，鄧穎超、李亮恭、徐悲鴻、林風眠、鄭彥棻、李宗侗、蘇雪林…等都曾留學或工作於法國，對中國急欲引入世界文明於國內作出貢獻與影響。作者認為：華法教育會在組織與應變上，力不從心，出現莫大敗筆。勤工儉學運動之失敗，領導者性格乃先知先覺型的理論家，非行政者、組織者，無良好的輔佐人才，沒有堅持到底的勇氣，焉得不敗。

然則歷史不以成敗論英雄，華法教育會的成立與留法勤工儉學運動的倡導，於其時代背景，乃首創民間推動留學教育新模式之壯舉。為有志出國留學的青年開闢一新管道，增加了機會與多一重選擇，並藉以養成獨立自主、勤樸精簡的時代新生活。尤其對清寒之學子而言，出國留學深造不再是富家子弟與少數考取官費幸運兒的專利了。再者，留法勤工儉學生雖未能全盡創辦人所憧憬的理想，或多或少都能實現部分的初衷。回國的留法學生，後來在學術、政治、實業上，多有卓越成就。這些，作者在文中並未述及。

在〈中法斷交前的一段外交秘辛—法國專使團的艱困訪華行〉的餘論中提到：

法國之所以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擔任主要穿針引線的人，名叫佛爾，他曾任法國第四共和的內閣總理(1952-1955)和外交部長，是位右派的教授和律師，以機智圓滑而出名。兩度訪問大陸，一九五七年試探性的活動，一九六

國立中興大學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三年九月廿三日為有任務的旅行。<sup>20</sup>

由註釋知道作者引用自己的舊著：〈從法國輿情看承認中共〉，《現代法國問題論集》（學海出版社，民國 66 年 10 月），頁 3-4。現代法國政治人物沒有附原文資料是值得商榷之處，法國政治左右分明，右派人物與左派共產主義的中國大陸交涉不符外交事務常理。經筆者查証，佛爾原名 Edgar Faure，擔任內閣總理的時間為：第一次一九五二年元月廿日至二月廿八日，第二次一九五五年三月廿三日至一九五六年元月廿四日。<sup>21</sup>佛爾的政治黨派一直是左派，曾入激進社會主義黨（Parti radical-socialiste），激進黨（Parti radical）和共和社會主義黨（Parti républicain-socialiste）。<sup>22</sup>

〈中法關係史研究之回顧〉前言第一段：

中法發生接觸甚早，至少可以上溯至十三世紀，即蒙古帝國時代。公元一二四五年（宋理宗淳佑五年）至一二四七年間，其時蒙古之勢力方張，歐西諸國亟欲知其虛實，法王路易九世<sup>①</sup>曾派遣方濟會士柏郎嘉賓（Jean de Plano Carpini）使於欽察汗拔都及蒙古大汗貴由<sup>②</sup>，通使之目的除了窺探蒙古的虛實外，當時正逢十字軍時代，不無帶有聯合蒙古夾擊回教徒的意圖。

23

註釋<sup>①</sup>：一說為教皇英諾森四世（Innocent IV）所派，參閱楊森富編著，《中國基督教史》（臺北，商務印書館，民國 73 年 4 月，四版），頁 46。

這個說法與余文堂〈元明清三朝天主教來華傳教與中德早期關係〉中的說法

<sup>20</sup> 本書 272 頁。

<sup>21</sup> [http://fr.wikipedia.org/wiki/Gouvernement\\_Edgar\\_Faure](http://fr.wikipedia.org/wiki/Gouvernement_Edgar_Faure)，2007/10/15

Gouvernement Edgar Faure（1）du 20 janvier 1952 au 28 février 1952;（2）du 23 mars 1955 au 24 janvier 1956.

<sup>22</sup> [http://fr.wikipedia.org/wiki/Edgar\\_Faure](http://fr.wikipedia.org/wiki/Edgar_Faure)，2007/10/15。

<sup>23</sup> 本書頁 287。

接近：教宗英諾森四世選出二位「方濟各會」的教士為特使團，他們分別是來自義大利中北部，貝魯吉亞(Perugia)附近的柏郎嘉賓神父(Giorani da Piano die Carpine, 1182-1252)，和來自神聖羅馬帝國的波西米亞的史德芬(Stephen)神父。余文堂在註釋 120 中說明柏郎嘉賓姓名的原文各家寫法不同：德禮賢神父寫為“Giovani da Piano di Carpine”，徐宗澤神父寫成“Jean du Plan-Carpin”，方豪神父寫為“Plano Carpini”，羅漁神父則寫為“John of Piano di Carpine”。<sup>24</sup>

陳三井註釋②所引的是：東世澂，《中法外交史》（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17年6月初版），頁1。柏郎嘉賓原文拼法（Jean de Plano Carpini）。查明柏郎嘉賓為義大利人，姓名正確的拼法為 Giovanni da Pian Del Carpine，則柏郎嘉賓到底由誰派遣出使東方？（一）當時法王路易九世與神聖羅馬帝國諸王侯無法組成聯軍，十字軍無力東征，受蒙古鐵騎黃禍之威脅，教皇甚感憂心。<sup>25</sup>（二）十三世紀初，義大利聖方濟各（St. Francesco d'Assisi）所創建的方濟各會（Franciscan Order）效忠教皇。（三）蒙古大汗所回文的國書對象是教皇，所以由教皇派遣出使應屬無誤，而非由法王路易九世所派。<sup>26</sup>以上論證，中法關係之嚆矢，仍有待考證。依據法國國家檔案，一二八九年蒙古伊兒汗國君主阿魯渾(Arghun, -1291)致法王菲力四世(Philippe IV, 1268-1314)書，為現存最早的文獻。<sup>27</sup>

〈中法關係史研究之回顧〉前言第三段：

大率言之，鴉片戰爭以前兩、三百年間的中法關係，主要是一種文化層面的關係，可以稱之為「傳教為體，學術交流為用」的一種對等關係。透過來華耶穌會士，若法人洪若翰(Joan de Fontaney, 1643-1710)、張誠(Joan Franciscus Gerbillon 1654-1707)、白晉(Joachim Bouvet, 1656-1730)、李明(Louis le Comte, 1655-1728)、馬若瑟(Joseph Marie de Prémare)等的介紹和

<sup>24</sup> 余文堂，〈元明清三朝天主教來華傳教與中德早期關係〉，《七十年來中西交通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臺北：輔仁大學歷史學系，1997年頁201-202。

<sup>25</sup> 余文堂，〈元明清三朝天主教來華傳教與中德早期關係〉，頁200-201。

<sup>26</sup> 此文書現存梵蒂岡圖書館，<http://asv.vatican.va/fr/doc/1246.htm>，2007/10/15。

<sup>27</sup> [http://en.wikipedia.org/wiki/Archives\\_nationales\\_%28France%29](http://en.wikipedia.org/wiki/Archives_nationales_%28France%29)，2007/10/15。

影響，一般法國學者文人對中國文化具有好感，並推崇備至。<sup>28</sup>

法國人的名字「若翰」拼法是 Jean，而非 Joan，法文耶穌會網站<sup>29</sup>記載：〈康熙皇帝與耶穌會士們在路易十四的時代〉：路易十四派遣耶穌會的數學家們到中國，他們是：Jean de Fontaney（1643-1710）洪若翰，Joachim Bouvet（1656-1730）白晉，Jean-François Gerbillon（1654-1707）張誠，Louis Le Comte（1655-1728）李明，Claude de Visdelou（1656-1737）劉應。<sup>30</sup>事實上，這個傳教團可視為科學團隊，曾在中國探勘地形，繪製地圖。1714 年雷孝思（Jean-Baptiste Regis）與馮秉正（Joseph-François de Moyriac de Mailla）會同德瑪諾（Romain Hinderer）亦曾來台測繪地圖，1718 年制成《皇輿全覽圖》，此乃世界地理學盛事，此一層面，值得再深入研究。

## 五、結語

本書所探討的問題主要包括：一、歐洲新帝國主義的擴張殖民：法國與英國相異者是，英國強大的海軍與殖民地是必需品，帝國的生命線。共和政體的法國，海軍遠征毋寧是一種奢侈品，國內反對勢力強大，對遠東的擴張只在少數對政治的聲望虛榮心。二、中國革命時期國際社會對待中國的態度及措施：各國皆以確保其在華勢力與商業利益，法國集中注意力於財政借款問題，與列強共同協商妥協，操縱中國新政府。三、歐戰時期中國的因應與協助及戰後的外交失利：因德國的無限制潛艇政策，中國採取與美國同步調對德宣戰，希冀戰後得收回德國在山東的租借。由於英日同盟與英法日密約，中國在巴黎和會中遭到挫敗。四、中法教育文化的交流活動：中國大批留學生前往法國學習新科學，對中國的現代化

<sup>28</sup> 本書頁 287-288。

<sup>29</sup> 耶穌會網站，[http://www.jesuites.com/histoire/chine/kangxi\\_math.htm](http://www.jesuites.com/histoire/chine/kangxi_math.htm)，2007/10/15。

L'empereur Kangxi et les jésuites au temps de Louis XIV

Les mathématiciens jésuites envoyés en Chine par Louis XIV

<sup>30</sup> 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http://zhouyi.sdu.edu.cn/yixueshiyanjiu/yanghongsheng.htm>，2007/10/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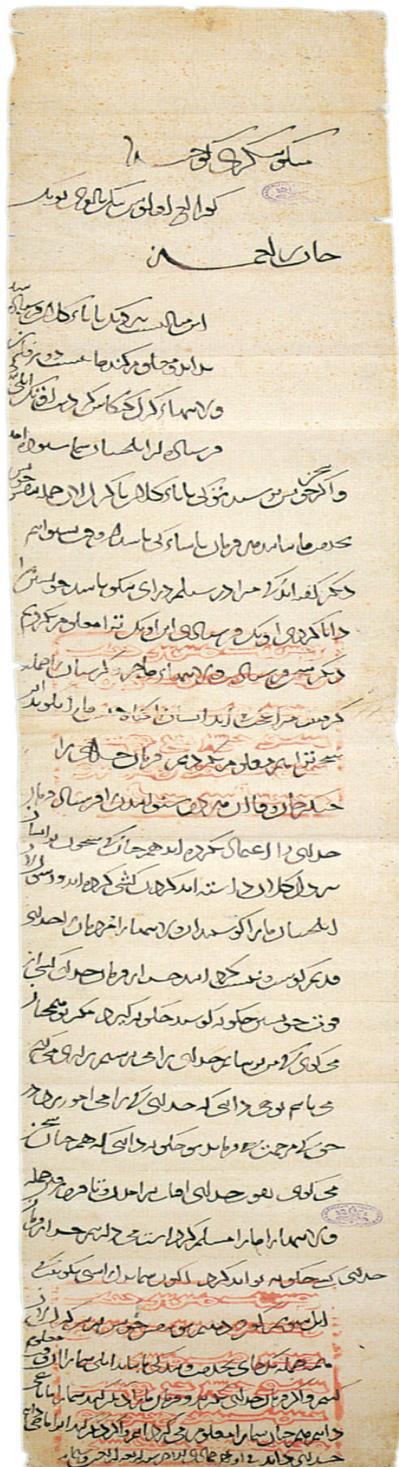
有重大影響。法國亦遣使東來中國，獲得合作，在法國推動漢學文化與研究。五、國際政治的現實與外交的運作：中國在進入世界體系與融入國際社會的過程倍嘗艱辛，因此更顯得外交關係研究的急迫與重要性。

在附錄部分，提供史學的訊息與期許：可以開闢的領域尙夥，可以擴展的視野仍多。作者在爬梳史料的過程中，或有所疏漏，惟總體而言，在中法關係史的研究上是承先啓後的重要標的。雖作者從序言到結語都謙稱是「輕、薄、短、小」的敝帚自珍之作，然則此「舉重若輕」的研究態度，「苦中作樂」的研究精神與「忙裡偷閒」的研究方法，深值讀者效法與學習。推薦此書給諸史學先進與同好，跂盼得如作者所望者，啓發更多學人投入中法關係史研究的領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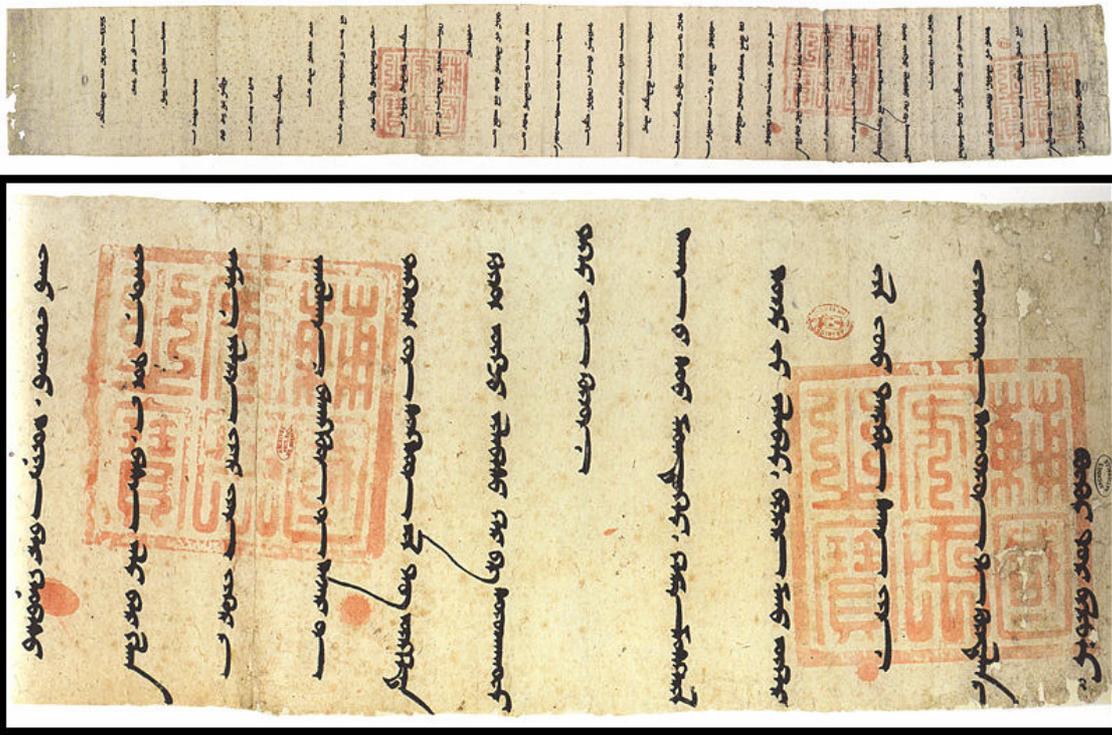
國立中興大學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附錄：



圖一：  
一二四五年蒙古大汗貴由 (Gran Khan Güyük) 致教皇英諾森四世國書，文書長寬 1012 x 200 公釐，以波斯文書寫，一式二份，印二次國璽以為封，一二四七年未送抵羅馬。文書大意為：蒙古大汗貴由婉拒教皇宣教，不願接受洗禮成為基督教，誠願保持友好之關係。  
<http://asv.vatican.va/fr/doc/1246.htm>，2008/5/1。



圖二：一二八九年蒙古伊兒汗國君主阿魯渾(Arghun, -1291)致法王菲力四世(Philippe IV, 1268-1314)書，意欲聯合法軍夾擊埃及，因阿魯渾遽世未果。文獻長寬 182×25 公分，高麗紙，古中東伊朗文，有元朝之印。

[http://en.wikipedia.org/wiki/Archives\\_nationales\\_%28France%29](http://en.wikipedia.org/wiki/Archives_nationales_%28France%29) , 2008/5/1 。